

## 2010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

角道量介( 东京大学文学部 日本东京) 撰

杨振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编译

本领域延续2010年的情况,有很多以中华世界为对象的研究,以及对东北亚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进行的通时性研究。此外,援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领域横向联合型研究也很活跃,出了很多优秀成果。为了全面理解古代社会,今后应进一步加深多角度研究。

一般性著作、概论性著作。一海知义《史记》(平凡社),1973年将其所著《史记》(筑摩书房)附上其所著《小说 李陵》(狩野直禎等《雄图飞翔·中国的群雄10》,讲谈社,1998年),取《史记》中有特色的轶事加以解说。鹤间和幸主编《诞生! 中国文明——从传说到历史》(中央公论新社)介绍了新石器至北宋有代表性的文物,同时收录了河南省的博物馆情况。

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首先是旧石器。佐藤宏之《旧石器时代的东北亚和日本列岛》(《考古学杂志》605)概观了以东北亚为中心也包含中国大陆的东亚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情况。指出旧石器早期,东北至东亚一直保持着前期特征,形成东亚型石器握斧群,东亚世界开始形成;旧石器时代中期虽然在中国南部还残留有东亚型握斧群,但华北、中国东北部开始普及调整石核系剥片石器群。

新石器时代研究,有中村慎一编《浙江省余姚田螺山遗址的跨学科综合研究》(《2007至2010年度科研资助报告书》,金泽大)是日中共同研究成果报告,进行了动植物遗存体分析和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等综合性研究,是一项重要成果。今村佳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男女偶人像》(龙田考古会编辑发行《甲元真之先生退休纪念 先史学·考古学论究V》下),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男女偶人像以及具有性别特征的遗物的分布和出土状况,考察了其功能和意义。指出中国华北、华中、华南除了性别不明的偶人像占主体外,象征男性的遗物比女性像出现、流行得早,新石器时代后期偶像制作全面衰退,后期制作的陶祖、石祖性质仍然不同。同氏《中国先史时代的动物样式》(《中国考古学》10)是一篇全面搜集新石器时代动物装饰、图像,通过考古学方法,考察其背后的制作者以及制作集团意图的论文。指出鸟图像、装饰的分布很广,所表现的动物与遗物的材质、表现方法有关。正如今村所指出,结合其他领域的知识进行综合性考察,应是所有考古学研究者今后的课题。王妙发《青海高原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和墓地研究》(《和歌山大学经济学会研究年报》14)将青海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所属各类型的遗址面积进行比较,认为无论哪种类型,一般聚落规模都在一万平方米以下。虽然通过包含遗物层的厚度可比较聚落的存续时期,但又如何复原各地区当时的自然环境呢?久保田慎二《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铃研究》(菊池彻夫编《比较考古学的新地平》,同成社)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铃进行分类,讨论与铜铃出现的关系。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陶铃可分为中原

系和北方系两大系统,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是在北方系陶铃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则是在中原系陶铃的影响下形成的。他还指出,根据出土状况可确定新石器的陶铃基本上是随身使用的日用品,不具有礼器的功能,但陶寺的铜铃虽然也不单纯与阶层制挂钩,但出土状况和二里头的铜铃相同。

中国大陆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新石器时代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末期四阶段,全面论述遍及中国全境的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周边地区。我们按照地区进行通时性介绍。首先是东北亚地区。大贯静夫《大、小兴安岭狩猎民的居住形态》(《比较考古学的新地平》)作为东北亚民族考古学的一个事例,介绍了中国东北地区、大小兴安岭山中兴起的属于北方满——通古斯语族先住民的居住形态。同氏《东北亚新石器社会的多样性》(菊池俊彦编《东北亚的历史与文化》,北大出版会)以平底陶器和竖穴房屋为特征的远东新石器社会为对象,指出随着旱作农耕的扩大,社会经历了从西向东、北变化的过程。此外还论述这一变化在远东各地是不一样的,指出仅以职业农耕的有无来评价社会是危险的。其次是北方草原地区。高滨秀《中央欧亚的复合弓》(《金泽大学考古学纪要》31)是一篇关于中央欧亚匈奴勃兴以前弓的论文。指出欧亚草原地区最早的复合弓是用蒙古的鹿石表现的弓,它很可能是斯基泰弓的源头,鹿石时期之后普及的板石墓文化期使用切入的骨、角制的弓弭在中国北部早期游牧民文化全面扩展,后来变化为大型化的匈奴——匈式弓,向西方普及。林俊雄《草原的考古学》(《东北亚的历史与文化》)详细论述了草原地区骑马游牧民的出现时期和斯基泰的起源。新疆地区。后藤健《新疆先史时代的聚落形态》(《比较考古学的新地平》)为了探讨尚不十分清楚的新疆地区先史时代的聚落形态,将新疆哈密地区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 Begash 遗址及周边地区的遗址分布状况进行比较入手,指出两个地区间存在共性,论证以新疆东部地区的组石遗构为居住地,沿天山山脉逐渐发展起有类似社会构造、生产形态的畜牧业社会。对于没有文献资料的古代中国的周边地区考古遗物和民族志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今后以这些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化。

殷周时代。关于青铜器制作技术的论文。今津节生、岛越俊行、河野一隆、市元里、樋口隆康、广川守《利用 X 线 CT 殷周青铜器的构造解析( I )》(《泉屋博古馆纪要》26)以殷周时代的青铜爵、斚为对象,为了搞清楚其内部构造,利用 X 线 CT 扫描仪探索其制作技法。认为当时器物本体和把手进行连接有两种方法,一是一体铸造的方法,一是在本体上预先铸造出榫头再嵌入把手的方法。同时指出了观察空间的位置。广川守、今津节生、岛越俊行、轮田慧《利用 X 线 CT 扫描仪殷代兕觥的内部构造解析》(《中国考古学》10)对殷代的兕觥进行了同样的分析。指出器物本体和把手的连接方法是用半环进行连接,与西周后期的匜的连接方法不同。铃木舞《关于东京大学文学部陈列室所藏青铜爵考察》(《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24)在对东京大学所藏的青铜爵进行仔细观察的基础上,推定其制作技术,指出二里头时期有特色的制作技术在二里岗时期的部分爵中依然使用,论证殷代前期的青铜器生产与“夏”的制作工人有关。考察青铜器制作技术和制作工人时,不能不考察它的铸型,但遗憾的是现在可资利用的资料不多。期待今后出土资料的增加。

殷代。内田纯子《商周青铜器的纹样、装饰研究》(《中国考古学》10)介绍了殷周青铜器

纹样和装饰研究的学术史,指出详细的编年研究的重要性,论述以此为线索有可能复原工匠组织和当时人的世界观。我认为,本文所指出的纹样反映的阶层性的时代变化和青铜成分比与装饰复杂化之间的关联性等,对于今后的青铜器研究是重要的视角。

周代。小泽正人《关于西周时代后期青铜礼器随葬的一考察》(《比较考古学的新地平》)通过对虢国墓地2001号墓和晋侯墓地93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进行分析,论述了两国所举行的祭祀均是由烹饪、盥洗、贡献构成的,推测不同的诸侯国举行相同祭祀仪式的背景是,当时处于周王朝祭祀大框架内的两国共同接受了王朝的祭祀,同时也纳入到其统治体制之中。其所指出的贡献用的青铜礼器是以偶数随葬的这一点很有意思。是否可以推测祭祀时贡献用青铜礼器的使用主体或者使用对象是以两人一组为单位呢?田畑润、近藤はる香《西周时代虢国对外关系的考察》(《中国考古学》10)对陕西省宝鸡市虢国墓出土的青铜器,从葬制和生产系统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昭王南征时期虢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结果虢国丧失势力,开始衰退。这是通过对青铜器纹样和铸造技术的数据化估算制作水平等青铜器分析的新尝试。角道亮介《西周时期关中平原青铜彝器分布的变化》(同上)通过西周时期关中平原青铜彝器的分布状况,解读西周王畿的范围。堤绘莉子《从金文资料看西周王室和册命礼仪》(《先史学·考古学论究V》下)指出西周中期后半段以降册命铭文出现定型化,册命礼仪是西周王室用以维持权力的行为。与册命有关的论文还有谷秀树《西周时期陕东出身者“周化”考》(《立命馆文学》617),从西周金文中纪年法、谥号、图像记号的变化、消失情况,认为出自陕东地区者“周化”是渐进进行的,同时透过对册命礼仪金文的考察,认为西周中期改革以后为了进入王朝政治的中枢,被“周化”是必要的,它加速了陕东出身者的“周化”。关于册命礼仪,武者章《西周册命金文分类的尝试》(东大《东洋文化》59,1979)曾做过研究,将册命金文分为Ⅰ—Ⅲ类,逐一考察了册命主体和赐与物、制作主体、出土地和时代,上述新看法与武者论文这样的以往研究有什么关系呢?黄川田修《韩城梁带村两周铜器考》(《早期中国史研究》2-1)论述陕西省韩城梁带村出土的西周后期至春秋初的很多青铜器相当于“两周王朝系青铜器群”,当地积极参加周王朝的礼制,属于“华夏系统国家”。此外还指出晋南地区与北方世界有密切关系,作为连接关中与北方新通道的晋南地区可能发挥了作用。

春秋时期。仍以《左传》作为基本史料进行研究。野间文史《春秋左氏传——其构成和基轴》(研文出版)关注《左传》的史料来源有戏剧,“说书”记录的成分,认为《左传》的重心,前期是齐桓、晋文的霸者体制,中期是晋和楚的攻防,后期是贤人政治的时代。此外,从晋文公、齐桓公霸业的评价方法,论述《左传》是从重视以周王朝为顶点的礼制立场编纂的,是通过儒家之手完成的文献。渡边英幸《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岩波书店)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出土文字资料进行研究,指出先秦时期的“中华”观念具有多层性,西周时期“夷”、“蛮”、“戎”与“中国”、“夏”不是对立的观念,进入春秋以后在形成多国间的会盟秩序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种意义上的“中华”框架:即异文化集团和诸侯国,与周王朝有血缘关系的各国和以外的“蛮夷”、“小国”,推戴周王的同盟体制的“诸夏”、“中国”和同盟以外势力,说明战国时期由特定的权力实现的多集团统合,形成作为“帝国”阐释原理的“中华”观念。小泽贤二《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汲古书院)记述了古代中国的历法,并讨论了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性质。而平势隆郎《不正确引用和批评的“形式”》(《汲古》57)及同名的补充资料,指出

上述小泽著作等对平势的评论采取的是在不正确引用的基础上而加以批评的方式。此外,同氏在《街角所见奇妙的表现2》(《史料批判研究》9)中指出,小泽等此后的论说也存在这样的“形式”。

江村治树《中国古代青铜货币的出现和发展(六)》(《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56)从先秦时期楚贝货的分布和铅含量的变化,论证指出其作为货币大量流通是在楚迁都陈以后,是为了应对新的经济状况而发行的。此外,还指出新石器至西周的宝贝不具有货币的性质,选择楚贝货作为统一货币的宝贝典型的背景是楚对周文化的强烈关注。小寺敦《先秦时期“让”考》(《历史学研究》871)在同氏《先秦秦汉时期传世文献所见“让”》(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6,2009)的基础上,关注先秦时期与君位继承有关的“让”的问题。指出虽然春秋以前也存在“让”的行为,但将这一行为与“让”字联系在一起是在战国时期。并阐述了这一发展过程:传世文献表现为“让”的春秋以前的君位继承本来是血缘间的继承,不具有战国时期“让”的要素,从春秋末到战国中期,与尚贤、尊贤有关,出现了血缘原理弱化意义上的“让”字,在此基础上,文献编纂者将过去的部分继承也使用“让”字。他还推测,与“让”有关的“周代宗法制”的理念也是这一背景下的战国中期以后形成的。吉田章人《从“堕三都”看鲁的三桓氏的权力构造》(《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93)从春秋战国时期掌握鲁国权力的三桓氏采邑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堕三都”的原因,认为三桓氏采邑的支配权最初是在得到邑宰和邑人的支持下形成的,当时还无法过渡到三桓氏直接进行统治,因此为了抑止内部纷争采取了“堕三都”行动。土口史记《先秦时期“郡”的形成及契机》(《古代文化》)61-4)指出以“郡”为焦点,是秦向传统统治地区——内史地区以外地区大规模扩张领土为契机的开始,提出不存在以春秋时期“郡”为单位扩大发展,向战国时期郡变化这一继承关系。

出土文字资料方面有浅野裕一编《竹简所述古代中国思想(三)》(汲古书院),佐佐木研太、下田诚《龙岗秦简译注(前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4)及海老根量介《战国〈日书〉反映的地域性和阶层性》(同上)等许多研究,但由于均是以战国时期为主要对象,因此这里不做介绍。

围绕铜和铁出现的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冈内三真《游牧民和农耕民的铜器》(《比较考古学的新地平》),关于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活动的紧密联系中,欧亚大陆金属器的使用是如何开始的,论文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出土的铜器为例,概述北方畜牧民和南方农耕民之间产生了不同的青铜文化。村上恭通《东北亚的早期铁器文化》(《东北亚的历史与文化》)考察东北亚地区的早期铁器文化,从这一地区的铁器普及与燕国的铸造铁器间的关系入手,认为铁器普及发生在战国后期。并推测普及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第二松花江向黑龙江,二是从朝鲜半岛底部通过渤海湾向日本海传播,但东北亚地区铁器实现自给却相当晚,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田中裕子《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早期铁器的传入与发展》(《比较考古学的新地平》)论述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期铁器的传来和向铁器文化发展的问题。认为春秋中期到后期,从陇东、宁夏南部向内蒙古中南部传入铁器并传播。利器类从青铜器向铁器转化,草原地区东部一带的速度要快一些,当地在战国后期已完成铁器化。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到陇东、宁夏南部地区,在西汉末年才完成铁器化。铁器的传播是由西向东进行的,而铁器化却是从东向西实现的。同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器的传来和发展》(《中国考古学》10)对新疆地

区进行了同样的考察。其结论是,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期的新疆Ⅰ期阶段很早就从西方传入了铁器,但在接着的Ⅱ期,利器仍然以青铜器为主,到了汉代以后的Ⅲ期大部分利器已实现铁器化,北方草原地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铁器化的进程几乎呈现着同样的情况。白云翔(槇林启介译《中国古代铁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松井和幸编《东亚的古代铁文化》,雄山阁)以出土遗物为中心论述了古代中国铁器的发展过程,殷代、西周时期主要是陨铁加工,并发明块炼铁渗炭钢技术,春秋时期发明铣铁制炼技术和铸铁脱炭技术,战国时期发明铸铁脱炭钢制钢技术,并开始使用锻釜技法,形成独自的技术体系。与技术发展相对应,引起铁器种类的增加和使用的扩大。他认为中国的铁器是从殷代以后独自发展形成的,但西周以前出土的铁器很少,而且尚未发现制铁遗址,因此将其与春秋以后的铁器作为连续的关系来追溯是有疑问的。正如白云翔自己所指出,有必要探讨它与分类为“西北系统”的新疆地区出土的铁制品之间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关系。

通时性研究。盐泽裕仁《千年帝都 洛阳》(同上)关注古都洛阳的都市环境,试图进行综合的人文、自然环境探讨。全面介绍了与洛阳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到宋代遗址有关的调查机构、博物馆。此外还报告了对县城和古街道所进行的历史地理调查,很有意义。松村博文、石田肇《东北亚的人类集团》(《东北亚的历史与文化》)根据人类学认识,论述过去二万年间东北亚人向极北、美洲大陆、中国南部和东南亚扩散。菊地大树《拉马车的马》(《中国考古学》10)聚焦先秦时期牵引马车的马,对当时马车的用途进行再探讨。认为先秦时期马车所用的马是蒙古马系统,根据畜产学的数据计算出行走距离和挽曳力,通过马车的大小变化与部材的树种鉴定所计算出与马车重量之间的关系,推测先秦时期马车的时速是七公里左右。对先秦时期的马车研究激引一阵波澜。入江文敏《中国的土器制盐(序说)》(《石川考古学研究会会志》53)介绍了以往研究,关于西周时期至汉代的制盐土器,对山东的盛形土器和四川、重庆的尖底土器、甕形土器进行了探讨。

关于思想、观念的研究。小南一郎《半开扉的另一面》(《国学院中国学会报》55,2009),提出关于古代中国人的“灵魂”观念的问题。正如“知”具有宗教意义一样,“灵魂”也是如此,送葬礼仪是为了将“灵魂”送往祖灵世界的“非个性化”行为。与现世重视个性化有关,送葬礼仪也在变化,但其后通过“非个性化”的程序以达到消罪的目的。他还指出,由于阴阳结合、“灵魂”升天的观念,夫妇合葬就是阴阳结合思想的表现。同氏《天帝的贵畜》(《泉屋博古馆纪要》26)探讨龙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功能的源泉。在梳理龙与水生动物、陆生动物、天象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强调龙与陆生四足动物特别是家畜之间的关系,关注龙所具有的升天的能力。根据《左传》、《晋书》中关于饲养龙时喂食的记述,《说苑·正谏》中关于白龙是天帝贵畜的记述,以及出土遗物中多用豚和牛来表现龙等,推测存在将龙和家畜相对应的礼仪,认为以家畜为牺牲供奉天帝,使天与地的交流成为可能的祭祀仪式的动物礼仪,与龙有关。他还认为饕餮纹也是家畜表现的变形,以此达到沟通祖灵世界和现世的功能。以龙为媒介的乞雨仪式是乞求雨从天上降到地上,由于雨与农作物的丰收有关,因此龙观念的起源应在新石器时代。高户聪《山川诸神的性质》(《集刊东洋学》104),指出先秦的“神”是将理念的祭祀秩序引向外在的神的存在的祭祀。神并非都要等待天的命令,也有要求独自祭祀的,这样的神主要是山川神。

如上所述 2010 年延续了尝试超越以往研究领域,进行新探索的趋势。但一方面,也应当注意不要轻易迎合新东西,必须进行慎重研究。对于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所依据的方法论和设问自身的界限,对所研究的对象从多角度进行思考探索。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 120 编第 5 号《2010 年的历史学界》

## 2010 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

〔日〕村井恭子 ( 神戸大学文学部 日本神戸) 撰

黄正建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编译

2010 年为纪念平城迁都 1300 年举办了“遣唐使展”等各种活动,还发现了记有“圆仁”名字的石刻并为此召开了研讨会。这些都引发了对隋唐史和东亚史更广泛的关注。

从研究倾向看,涉及国际关系和欧亚大陆东部的论著依然很多,而处于低潮的是与国内诸制度相关的官僚制、土地制度等,以及女性史和氏族史。

政治·军事·经济。应该大书特书的是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财政与国家》的出版。该书由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部分构成,主要从比较长的时段考察了财政、物流、赋役。平田阳一郎《关于隋代的镇戍制度》(《沼津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研究报告》44)从否定“唐代兵制=府兵制”出发,探讨前朝即隋“镇戍制度”的具体状况,结束于对军事据点和兵卒等的预备调查阶段,今后的进展令人期待。此外,《唐代史研究》13 号是“军事与财政”特集。首先,丸桥充拓《府兵制下的“军事财政”》整理、批评了以前的研究角度,试图重新看待府兵制下的军事财政——这一财政以前被认为是“廉价”的;同时也重新追问军制和国家财政的实际状况。其次是高濂奈津子的《关于唐后半期的财库》,文章追溯了财库的设置和机能变化,并就唐末新设置的延资库(备边库),考察了由皇帝和宰相进行财物运营的情况。此外,村井恭子《唐宣宗时期的西北边境政策试析》(《唐研究》16)注意到河湟三州七关回归、张议潮使者到来、党项叛乱这三个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发展于唐西北边境。文章从军事、交通、经济各方面考察了宣宗朝的政策对应。

律令·制度。刑罚方面有辻正博的《唐宋时代刑罚制度研究》(京大学术出版会)。中国方面已经由魏斌发表了书评(《唐研究》16),日本方面的专评令人期待。

近年来处于研究低潮的身份制及地方行政·村落制度方面,首先有山根清志的《由身份制特质所见之唐王朝》(《历史评论》720),论述了“高级”私贱人身份的部曲客女,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开从“法定税收对象”的良人一下子就跌落到“最贱”的奴婢而设置的,并指出由于《天